

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

曹文柱

本文界定的西晋前期，是指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而言的。在这一时期，朝廷之内的朋党纷争异常激烈，武帝也殚思竭虑地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对策。它构成了当时高层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不但对于西晋前期的政治格局影响甚大，而且牵动了王朝后来的历史命运。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尚未有人系统地研究过这个值得注意的课题，笔者拟拾遗补阙，就此作一探讨。

一、西晋前期的三次党争高潮

《晋书》对于西晋前期党争的记载不但材料分散，而且简略不清。我们综合他书，条分缕析，大致可以判定武帝在位期间曾出现过三次党争高潮。

第一次党争高潮发生在泰始七年（271）到八年（272）之间。

党争的一方是以贾充为首的助司马氏篡魏的功臣集团。这是执掌西晋朝权的主流派，比较活跃的成员有荀勖、冯统、何曾、石苞、荀顛等人。

另一方则由任愷唱主角，“而庾纯、张华、温颢、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愷善”（《晋书·任愷传》），遂结成朋党；同时，他们还得到了裴楷、李熹诸人的配合。此外，这一派人中也有表面态度暧昧，甚至故作遮掩，实为幕后领袖的羊祜等人。

党争的中心是争夺中枢决策权。非主流派的重点目标是企图摧毁敌党的核心人物贾充。

党争的高潮虽在泰始后期，然非主流派的发难却早在武帝践阼之初。《晋书·郑冲传》：“司隶李熹、中丞侯史光奏冲及何曾、荀顛等各以疾病，俱应免官。”其后，任愷利用侍中的地位不断地同贾充进行直接冲突，“愷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后承间言愷忠贞局正，宜在东宫，使护太子。帝从之，以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计画不行。”（同上）泰始七年，双方矛盾激化。裴楷直斥武帝“失德”是因“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晋书·裴楷传》）。任愷、庾纯乘机以秦雍地区变乱需重臣出督为借口，诱武帝“诏充西镇长安”（《晋书·任愷传》）。一时，非主流派排斥贾充的计划几乎成功，“朝之贤良欲进忠规献替者，皆幸充此举，望隆惟新之化”（《晋书·贾充传》）。不料，荀勖为贾充设计，在出镇钱行之时，“论太子婚姻事，书因言充女才质令淑，宜配储宫。而杨皇后及荀顛亦并称之。帝纳其言。会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既而皇储当婚，遂不西行。诏充居本职。”（同上）。任、庾的希望落空。两党争衡愈演愈烈，在次年呈白热化。《资治通鉴》卷79泰始八年条概述当时形势云：“七月，以贾充为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如故。充与侍中任愷皆为帝所宠任，充欲专名势而忌愷，于是朝士各有所附，朋党纷然。”武帝亲自出面调解无效。不久，贾充伪称任愷才堪典选，使武帝改授他为吏部尚书。任愷既在尚书，失去了与皇帝接近的机会。贾充、荀勖、冯统承间浸润，制造了一起御食器的冤案，任愷终被免官。“愷既免而毁谤益至，帝渐薄之”（《晋书

·任愷传》)。任愷遭废后,庾纯改挑大梁,利用贾充宴请朝士之机,借酒骂座,乃至“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佑之,因得出”(《晋书·庾纯传》)。贾充之党何曾、荀勗、石苞纷纷上书要求严惩庾纯,另一党则极力回护辩解,双方在朝廷上展开了一场大论争。最后经武帝裁决,庾纯被削职改授他官,事情才有了结。

这次党争以非主流派的失利而告终。

第二次党争的高潮发生在咸宁五年(279)到太康元年(280)之间。

党争的一方仍是以贾充为首的功臣集团,荀勗、冯统为其朋党的中坚。

党争的另一方是张华、杜预等人。另一成员羊祜由幕后转到前台,但由于突然去世,没有赶上党争的高潮。

两党中,因有些人衰老病死和被解职,成员较前次党争数日减少。

党争的中心是围绕着对平吴战争的态度而展开的。

台湾学者徐高阮在《山涛论》中曾论辩了羊祜是任愷、庾纯等人的幕后领袖,并指出泰始五年(269)他由内廷外调襄阳是贾充排挤的结果(文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册,1969年台北版)。《晋书》本传讲羊祜“贞恣无私,疾恶邪佞,荀勗、冯统之徒甚忌之。”特别是在平吴决策上他与贾充歧异尤大。羊祜屡陈平吴之策,然“议者多有不同,贾充、荀勗、冯统尤以伐吴为不可。……唯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与帝意合,赞成其计”(《资治通鉴》卷80)。表面上这是平吴决策的争执,实际上是前一次党争的继续。徐高阮指出,贾、荀、冯等人“是一个政治上反对羊祜的力量。这个力量在当时的反对平吴也便可以推测不是根据真正的军事考虑,而是根据深秘的政治谋划,是为了阻止羊祜得到成就了平吴大功而回到中枢的机会。”由于功臣集团力量太强,羊祜之策虽然可行并有武帝支持,但拖到咸宁四年(278)羊祜入朝病死也未能实行。继任的杜预遭到了与羊祜类似的命运。咸宁五年(279)围绕着平吴决策问题的党争加剧。张华有效地利用了中书令加散骑常侍的地位,促成了武帝的决心。这时,“贾充、荀勗、冯统固争之。帝大怒,充等免冠谢罪”(同上)。平吴之役的实施是反主流派的胜利,但这个胜利并不完全:反对平吴最力的贾充被委任为南征的主帅。可见武帝对主流派的感情倾斜,同时也是贾充一党势力太大的明证。战争中,贾充还不断上表破坏,要求召回诸军,腰斩张华以谢天下。充表一奏,两派纷争又起。荀勗奏宜如充表,而“杜预闻充有奏,驰表固争”(《晋书·贾充传》)。平吴胜利,似对这次党争作一公正的结论,但结局却出人意料之外:贾、荀、冯等人同有功者一样进封受赏。是非曲直没有标准,贾充等初怀惭惧,继而有恃无恐,反“疾张华如仇”(《晋书·冯统传》),加剧对他的迫害。战功赫赫的杜预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晋书·杜预传》)。

第三次党争的高潮发生在太康三年(282)到四年(283)之间。

这次党争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功臣集团的首领贾充态度暧昧,实际上已退出党争。这一党由荀勗、冯统主持,另有外戚杨珧兄弟参加进来。

另一方的成员有张华、和峤、李熹、羊琇、王浑、王济父子、甄德及太常博士庾粲数人。武帝的同母弟司马攸是这一党人的幕后人物。

党争的中心是争夺皇位继承权(后改为辅政权)。

司马昭生前，司马攸曾是武帝争夺太子位的手，后来又成为朝臣呼声最高的皇位继承人的候选人。反主流派在两次党争失利后，则寄希望于他。这一方面是因武帝“诸子并弱，而太子（司马衷）不令”（《晋书·齐王司马攸传》），有从晋廷长治久安考虑的因素，另一方面也由于“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统皆谄谀自进，而攸素疾之”（同上），双方有共同的敌人，促使反主流派愿意拥戴司马攸为领袖。而贾充因两个女儿分别嫁与司马攸和司马衷，二婿亲疏相等，处境尴尬，故态度暧昧，恰不久病死，在这次党争中基本未起作用。主流派破坏司马攸承位最好的办法是迫令其还藩就国。荀、冯二人早在咸宁二年（276）就开始谋划这一策略，次年杨珧也进此策。另一派人则极力鼓吹太子不堪为嗣，应改立齐王司马攸。《晋书·和峤传》载和峤在吴平之后，“转侍中，愈被亲礼，与任恺、张华相善。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后与荀顗、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既奉诏而还，顗、勖并称太子明知弦雅，诚如明诏。峤曰：圣质如初耳！”《晋书·张华传》也载，吴平“帝问华：谁可托寄后事者？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太康三年，武帝一度病重，两派为争夺储位人选，再掀党争。《晋书·冯统传》：“帝病驾得愈，统与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攸素薄勖。勖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于己，乃使统言于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废矣！齐王为百姓所归，公卿所仰，虽欲高让，其得免乎？宜遣还藩，以安社稷。”《齐王攸传》的记载与此类似。《晋书·杨珧传》也称，“珧初以退让称，晚乃合朋党，构出齐王攸。”武帝从私欲出发，听从荀勖等人的建策，于这年末诏令齐王出督青州。此诏一出，尚书左仆射王浑马上上书求留齐王。这次他不提改立太子，而求留司马攸于京辅政，拥攸派纷纷响应。《资治通鉴》卷81综述此事件云：“于是扶风王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皆切谏，帝并不从。济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颡涕泣，请帝留攸。帝怒，谓侍中王戎曰：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哭人邪！乃出济为国子祭酒，德为大鸿胪。羊琇与北军中侯成粲谋见杨珧，手刃杀之；珧知之，辞疾不出，讽有司奏琇，左迁太仆。琇愤怒，发病卒。李熹亦以年老逊位，卒于家。”反主流派的行动再告失败。次年正月，武帝迫令齐王就国。太常诸博士上书反对，撰书人庾蔚为庾纯之子。“蔚草议，先以呈父纯，纯不禁。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并过其事”（《晋书·庾纯传附子蔚传》）。武帝大怒，欲将他们以大不敬罪杀死，但遭拥攸派的一致反对，终免死除名。司马攸乞留京郊守陵，不允，发死而亡。冯统在司马攸死后还对武帝称：“齐王名过其实，今得自终，此乃大晋之福”（《晋书·冯统传》）。第三次党争至此结束。

以上是三次党争的简要轮廓。每次党争的具体起因和过程有很大不同，但党争的中心始终围绕着对中枢决策权的争夺。如果说前两次党争反主流派的行动主要是从现实目标出发，那么后一次党争则明显是他们着眼于将来，寄希望于武帝身后的朝廷权力了。

关于党争的两派构成。从主流派方面看，成员一般比较整齐，主要是助司马氏夺位的功臣集团。而反对派一方，背景参差不齐。成员中既有为司马氏取得政权建立功勋的羊祜、裴楷、任愷诸人；也有与司马氏有姻亲的羊琇、王济、甄德等；同时还包括一些被迫屈服晋廷的原反对派或家族门第比较低微的，前者如向秀，后者为张华。

前两次党争中的双方，从人品人格到政见上的差异较大。后一次两派在为人上界限日渐

模糊,只能视作是前两次党争的余波。

二、西晋前期党争发生的原因

西晋前期党争发生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出现此伏彼起的激烈党争,与西晋政权结构的性质密切相关,它是一种特殊的大族政治的产物。

在君主专制政体中,皇帝应该对一切国家事务拥有决定权力,但受个人能力、精力的限制,实际上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皇帝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统治,通过在他的周围设置决策和执行的机构,分担他的权力和各种事宜。我们把这种在皇帝周围的由若干人分掌国家大权所形成的群体,习惯称为中枢权力圈。由于所从属的政治集团不同,政治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区别,以及受长远利益和既得利益的左右,在中枢权力圈内出现派系几乎不可避免。当然,这种派系斗争随着皇权的强弱,有时表现得比较活跃,有时表现得不够明显。在大族林立的汉末魏晋时代,军阀混战和朋党纷争成为大族政治互为补充的两种形式。前者为大族动用武力争夺皇权,后者是他们通过在中枢权力圈内争夺最高决策权以互相制约和瓜分皇权。曹魏凭借武力起家,武、文、明三世又实行一贯裁抑豪强,破散朋党的名法政策,高压之下,朋党纷争的形迹不显。但派系的活动从未消歇,只是转变成一种隐晦的形式罢了。所以待曹睿一死,党争马上公开化。司马氏靠纠集朋党的力量夺得曹家天下,顺便也把朋党活动作为政治遗产继承了下来。新建的西晋王朝带有极鲜明的大族联合政权的色彩,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40页)。作为大族之一的司马氏家族虽然凌驾于其他大族之上而成为皇室,但却没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绝对的优势,立国背景极其脆弱。朝内的大族林立,形成与集权对抗的离心因素。司马氏愈是实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尽心照顾大族的利益,愈是使这种分权的力量加强。西晋前期的朋党荆棘丛生是从大族政治的肥田沃土中滋养出来的,只要王朝的政治格局不变,在尚未出现军阀大战的形势之前,朋党纷争即不可避免。

其次,西晋王朝禅代的野蛮方式和功臣集团大多数成员的人格卑下,使得西晋王朝和它权力核心中的主流派,从开国时起即威望不高和声誉欠佳。这也是西晋王朝中枢权力圈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反对派的原因。

司马懿父子为聚敛权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轮换使用背信欺诈和翦伐杀戮的手段,残酷地消灭一切政敌,制造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攻杀皇帝、族诛朝臣,甚至对一些不肯合作的布衣之士都要消灭的血腥事件。这类丑闻不但在当时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不满,而且连司马氏家族内也有人对此表示异意。《晋书·安平献王司马孚传》讲,魏帝高贵乡公被杀后,司马懿之弟司马孚枕尸恸哭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当与禅位的陈留王哭别时,自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他在临终遗令中仍然表示了类似的决心。甚至几十年后,司马氏的子孙对前辈在禅代之际的行为也甚感羞耻。《世说新语·尤悔》:“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箬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在党争中,庾纯骂座,向贾充质问:“高贵乡公何在?”表面矛头指向贾充,实际上是在对王朝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抨击。

西晋功臣集团主要由一群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品行恶劣的佞幸小人构成。如武帝的第一号心腹贾充，曾“抽戈犯跸”，是杀害魏帝的元凶，入晋后“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史家说他“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荀勖“为正直者所疾，而获佞媚之机”；荀顗“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获讥于世”；冯统“外聘戚施，内穷狙诈”；王沈卖主求荣，“甚为众论所非”；石苞“好色薄行”；何曾“外宽内忌”，“卑（贾）充而附之”。（上引见《晋书》各本传）相对地来说，反主流派的成员一般为人比较正派，并多为学者。

中国古代的朋党，一般无严密的组织形式，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性情相近，气味相投。孔子曾讲：“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西晋功臣集团为私利而朋比为奸，党同伐异；与他们为人处世、道德标准不同的非主流派，也自然会在反对共同政敌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形成派系。

再次，晋武帝的特殊处境和个人性情，使他无法对朋党纷争采取严厉态度，从而助长了派系势力的发展。

司马炎是司马懿的孙辈，属于开创晋朝基业的第三代人。他与功臣集团成员的关系，同父祖两辈人不一样。这些人名义上应算作他的长辈。司马炎在与其弟司马攸争太子位时，贾充等都替他帮过大忙。禅代功进，更是靠功臣集团出的大力。所以在开国之初，司马炎就未能形成控驭这些人的绝对权威，相反倒有一种依赖感，甚至是负疚感。而非主流派也有一些成员为晋室立过大功。对付他们之间的朋党之争，武帝的举措不得不颇费斟酌。

另外，《晋书》本纪称司马炎性格“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讷正，未尝失色于人。”《太平御览》卷148所引王隐《晋书》也讲他“宽仁厚德，深沉有智量风度。”史书的记载尽管有溢美之词，然其性情比较宽容，确实不虚。如对庾纯骂座时讲出的过激言论，并未加深究。初登帝位，向裴楷问“天下风声，何得何失”，裴楷讲其“未比德于尧舜”，也能容忍（《晋书·裴楷传》）。平吴后，武帝顾盼自雄，特问司隶校尉刘毅：“卿以朕方汉帝何也？”他仰首伸眉等待刘毅的颂扬，不料得到的却是“可方桓、灵”的回答。武帝没有恼怒，辩解说：“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待刘毅批评他卖官钱入私门后，仍自我解嘲地说：“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晋书·刘毅传》）。这种宽容的性格也使他很难采取严厉的态度制裁和破散朋党。

最后，我们认为，武帝容忍朝廷存在党争，还有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

皇帝与中枢权力圈的关系非常微妙。在皇权强大的时候，避免朋党纷争对皇帝集权和提高国家机器的运行机能是有益的。但在皇权薄弱的时期，中枢权力圈内存在两派对立明显优于一派突出，这样可以使他们互相消耗、互相制约，从而避免他们集中力量把矛头指向皇帝，威胁先天不足、力量有限的皇权。关于武帝的这种良苦用心，正是我们在下一部分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三、晋武帝对付朋党的政治术

司马炎虽然无父祖的创业之功，但在知识素养和权谋上并不劣于他的前辈。在对付党争方面，他的政治手腕相当地高明，这也是西晋前期尽管朋党纷然，但政局基本稳定，而且他

本人越来越能够从容驾驭臣下的一个原因。史称其“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还是比较公允的。

如果将武帝对付朋党的政治术归纳起来，大约可有以下五种：

（一）平衡的政策

允许朋党存在是西晋前期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需要，所以武帝对待对立的双方一般不取压制和消除的方针，而是给予很大的宽容，并尽力地加以调解和安抚。如《晋书·任愷传》讲贾充和任愷冲突严重，“于是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愷于式乾殿。并谓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当和。”再如，庾纯骂座后，贾充恶人先告状，并以“上表解职”相要挟，庾纯则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表示谢罪。武帝对矛盾着的双方，基本上是各打了五十大板。他下诏说：“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古人云：由醉而言，俾出童叟。明不责醉，恐失度也”（《晋书·庾纯传》）。对于和峤和荀勖的纷争，武帝亦如法炮制。《晋书·和峤传》载，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峤鄙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峤始也。”

（二）倾斜的政策

倾斜与平衡，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司马炎的平衡术，并非在任何时候，处理任何问题上，对于对立的各方都完全公允。他感情的天秤是倾斜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武帝偏袒亲信的作法十分执拗。从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排列的西晋中央重要官职就任情况来看，功臣集团在决策和执行机构中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使他们牢固地构成了中枢权力圈中的主流派。这种情况在平吴之前更为明显。在对待贾充和张华两人不同处理方式上，清楚地显现了武帝的这种倾斜政策的露骨性。

从武帝受禅始，贾充便被授予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的职务，既参与机密又有军政实权。裴秀死后，他升任为尚书令，并改常侍为侍中，车骑将军如故，成为荀勖所说的“国之宰辅”。伐吴之役，贾充极力阻挠，却反被授予南征主帅的职务，优宠之荣，罕见于史。《晋书·贾充传》载，“伐吴之役，诏充为使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给羽葆、鼓吹、缦幢、兵万人、骑二千，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增参军、骑司马各十人，帐下司马二十人，大车、官骑各三十人。”贾充还不欲行，诏曰：“君不行，吾便自出。”贾充才被迫上路。而平吴决策的主谋者，张华只不过被委为度支尚书，量计运漕。杜预所统之部才是六路伐吴大军中的一支。张、杜二人并受贾充节制。战争中贾充一会儿要退兵，一会儿要腰斩张华，平吴后却仍赐帛增邑。武帝此举，对贾充未免宠之太过。

张华博学多才，平吴之役又立有大功，史称其“名重一时，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荀勖、冯统只略微一作手脚，武帝便将张华出为外镇。待张华在幽州再建功勋，“朝议欲征华入相”时，冯统复加离间，武帝疑虑又起，“顷之，征华为太常。以太庙屋栋折，免官。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晋书·张华传》）。武帝此举，对张华未免待之过苛。

（三）防戒的政策

司马炎富于精明的政治才干。他虽对亲信极力袒护，但深知他们的人品，所以颇具防戒之心。石苞是开创晋室的要臣，却因“自诸葛诞破灭，苞便镇抚淮南，士马强盛”，而使武

帝对他保有警惕。等到淮北监军“密表苞与吴人交通”时，“武帝甚疑之”，甚至将此事与吴人偏师北进联系起来：“吴人每来，常东西相应，无缘偏尔，岂石苞果有不顺乎？”“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遣镇东将军、琅邪王佃自下邳会寿春。”结果是一场误会，但武帝将错就错，仍命石苞“以公还第”，不再复职（《晋书·石苞传》）。武帝给予了贾充很大的权力和信任，但一发现他在对待司马攸的态度上暧昧，毫不犹豫地“夺其兵权”。武帝晚年，两派人物陆续凋零，荀勖、冯统二人地位日渐突出。在冯统死后，武帝立即削夺荀勖的实权，由中书令改授尚书令。史载：“勖久在中书，专管机要。及失之，甚闷闷怅怅。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邪。”（《晋书·荀勖传》）

（四）另树新人的政策

为了维持朝廷的平衡和稳定，司马炎还努力培植新的抗衡力量，试图把中枢权力圈内的两派对立转化为多极均衡。这主要表现在他从在位的中期开始启用外戚和宗室。

《晋书·杨骏传》：咸宁二年（276）杨骏“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东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尚书褚碧、郭奕并表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帝不从。”还讲，“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而骏及珣、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病重后，武帝又封杨骏为辅政大臣。

在重用外戚的同时，武帝还提高宗王的权力。他加封叔父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侍中诸职。晚年疾笃，“乃诏中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晋书·杨骏传》），并“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侯，以典禁军”（《晋书·武帝本纪》）。

到他统治的末年，由外戚和宗室组成的新派系，已具备了能够抗衡甚至压倒原来旧党的力量。正如《本纪》所讲，当时武帝“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与晋初开国形势已截然不同。

（五）通过平吴战争加强个人与王朝权威的政策

前文已述，在武帝即位的初期，晋王朝和他个人的权威都是不高的。武帝意识到，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运用权谋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外，还应该作出一些超越前人成就、震扬国威的大事，从根本上提高个人与王朝的权威。当时，消灭南方的孙吴政权，结束自汉末以来将近百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国家的统一，在这类大事中属于最为突出的。

司马炎完成一统的宏愿，从即位之初就已产生。泰始五年羊祜的外出，既有党争受排挤的因素，也有武帝用他经营南边的安排。《羊祜传》：是年，“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在平吴的问题上，武帝一直同非主流派的观点保持一致。当羊祜病重，“帝欲使祜卧护诸将”，可见他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态。只是内部条件不成熟，才一而再拖延下来。通过平吴战争的胜利，武帝增加了自矜的资本，个人及王朝的威望确实得以加强。

四、武帝的“成功”与惠帝的悲剧

西晋前期，司马炎对待党争的政策，基本上说应是成功的。首先，终武帝之世，政局基

本稳定, 社会秩序良好, 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其次, 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强化了王朝和皇帝个人的权威, 使西晋成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 唯一实现了统一的王朝。唐太宗在《晋书》本纪后作制称赞晋武帝说: “于是时, 民和俗静, 家给人足, 聿修武用, 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 断雄图于汉表。马隆西伐, 王濬南征, 师不延时, 獯虏削迹; 兵无血刃, 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 服前王之未服。贞祥显应, 风教肃清, 天人之功成矣, 霸王之业大矣。”

但是, 武帝的成功又是相对的, “成功”之中潜伏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危机。首先, 司马炎对策中的许多重大方针只是敷衍一时的权宜之计, 甚至在饮鸩止渴。例如他启用外戚和宗王, 就为新的动乱埋下了祸根。在他的生前, 辅政大臣的争位斗争即已发生; 到他一死, 权力之争马上升级为相互间的屠杀, 再后竟然演变成一场残酷的军阀混战。其次, 武帝的成功, 很多是靠个人权术驾驭的结果, 人存政在, 人死政亡。武帝去世, 很快就出现了无人能够填补代替的职位空格, 给继承人留下悲剧式的命运。很多讨论西晋灭亡原因的文章, 都假设齐王司马攸承位可能会使西晋免于速亡。笔者对于这一论点, 很难苟同。惠帝的悲剧固然不能避免, 但齐王司马攸也很难控制住武帝身后的西晋政局。这因为司马攸只是一派人的领袖, 根本无法制服朝内扰攘的群雄。

本文附带为晋惠帝司马衷的“白痴”称号, 作一小小的翻案文章。我们认为, 惠帝确实智商不高, 但绝非是晋安帝那样“自少及长, 口不能言, 虽寒暑之变, 无以辨也”(《晋书·安帝纪》)的白痴。史书记载的“蛙鸣”、“肉糜”之说, 对于长于深宫的太子来说, 缺少生活知识和对百姓疾苦不了解, 并不足为奇。相反, 惠帝能读书、写字, 还能对某些政治问题提出见解, 都证明他非白痴。如太安元年齐王司马冏兵败被囚, “(长沙王)又擒冏至殿前, 帝凄然, 欲活之”(《晋书·齐王冏传》)。永兴元年(304)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争战。混战中, 侍中嵇绍“以身卫帝, 兵人引绍于辕中斫之。帝曰: 忠臣也, 勿杀!”几天后, 惠帝遇救, “左右欲浣帝衣, 帝曰: 嵇侍中血, 勿浣也”(《晋书·忠义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此文处下注曰: “孰谓帝为慧愚哉!”惠帝的智商大概与蜀汉后主相类, 只是运气不及刘禅。西晋皇位, 聪慧及阅历丰富者尚未必能承, 何况才智、资历与乃父司马炎相距甚远的司马衷呢! 大局铸成, 焉能不败?

(上接第84页)

- ⑩ 张兰君、彭聃龄: 《汉语阅读中语音的作用》待发表。
- ⑪ 彭聃龄、郭德俊、张素兰: 《回忆性同一判断中汉字信息的提取》《心理学报》1986年第3期。
- ⑫ 彭聃龄、王士芬、张瑞兰: 《汉语单字词意象值的测定》《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 ⑬ 王翠翔、彭聃龄: 《中英双语读者的词汇表征(二)》《心理学报》1989年第1期。
- ⑭ 张浩、彭聃龄: 《汉语的语境信息对抽象句和具体句回忆的影响》待发表。
- ⑮ 鲁忠义、彭聃龄: 《故事图式在故事理解中的加工机制》待发表。
- ⑯ 张素兰、冯伯麟: 《场依存性对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效果的影响》《心理科学通讯》。
- ⑰ 伍芳辉、彭聃龄: 《影响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因素》待发表。
- ⑱ Peng Dan-ling, Orchard, L. N. and Stern, J. A. Evaluation of eye movement Variabl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readers. *Psychol. Sci.* 1983.
- ⑲ 王翠翔、彭聃龄: 《中英双语读者的词汇表征(一)》《心理学报》1988年第4期。